一个“阶层跃升”的样本

《张医生和王医生》真正的主题并不是“如何实现阶层变迁”，而是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如何利用知识和经验，构建出一个“新的自我”。

□ 张 丰

11月才出版的《张医生与王医生》，已经第二次印刷，它也在年末各种图书颁奖中斩获奖项。即便还没有读，人们也能从书名中感受它带来的冲击。它写的是一个“平凡”而又有普遍性的故事。

从工人家庭脱颖而出

这本书是完全写实的，张医生叫张晓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王医生叫王平，是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第一作者伊险峰和他们是初中同班同学，高中同校不同班。

他们都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在著名的工业区沈阳铁西区长大，是工人家庭长大的孩子。高中毕业后，他们考上大学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见过面。初中毕业30年，有人搞了同学会，他们得以重新联系，已经是著名媒体人的伊险峰，决定写出张医生和王医生的故事。

这是一个“阶层跃升”的故事。在铁西区的工人家庭，像他们这样考上大学的“工人子弟”，不到10%，大部分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人，长大后就像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那本书中所写的那样，子承父业，又当了工人，在上世纪90年代末遭遇东北国有企业改革，成为下岗职工。而张医生和王医生，则成为著名医院的专家，成为公众心中的“成功人士”。

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张医生和王医生是典型的“新中产”：受过良好教育，收入高，也在社会上享有声誉。保罗·威利斯那本享誉世界的《学做工》，主题是“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子女大部分又当了工人”，重复父母的命运。而《张医生与王医生》处理的主题则是“少数人”：为什么有些人能够脱颖而出，实现阶层跃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困惑？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励志故事。即便用现在的观点看，张晓刚的母亲也是一个“鸡娃高手”。她对自己的智力很自负，也对儿子要求严格，禁止张晓刚和成绩差的孩子一起玩，鼓励他在学习上的各种探索。在这种严厉的管教下，张晓刚的哥哥和妹妹，也都受过较好教育，“脱离”了自己的阶层。

视觉中国供图

城市与时代

《张医生与王医生》的第一作者伊险峰是资深媒体人，这本书是完全写实的。但是，要把它完全归入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又显得过于武断。实际上，作者的抱负要大得多。在书写个人际遇的同时，作者还有两个更大的维度：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人阶级”的转型。

尽管在张医生那个班级中，最终考上大学的很少，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观察，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今天，中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大增加。有专家估计，现在达到“中产”的人数，可能有2亿人以上。从1998年开始，大学大规模扩招，现在一年毕业的大学生达到千万级。

在过去30年，有大量像两位医生的普通人，脱离“工人”和“农民”家庭，成为一个新的“市民群体”。在今天的大城市，我们很难发现哪些人像“工人”。即便是沈阳这样的传统工业城市，也经历一个“城市的士绅化”过程。新的城市化，更看重商业氛围，商场、咖啡馆、画廊或者书店，取代过去的工厂，成为日常景观。张医生他们小时候生活的铁西区，作为工业区几乎被整体拆迁，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商业楼盘。

换句话说，张医生和王医生，在社会上并不是“少数派”，在他们身上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他们代表了全国千千万万工人子弟，从小生活在集体文化中，长大后经历剧烈的社会变革，这样的故事在各个大城市都在发生。在我居住的成都东郊，过去也是大片工业区，现在则全部都是楼盘，这里一定也有很多张医生这样的人。

重新构建自我

当然，这本书关注的并不是宏观变迁，而是个人命运，要在个人身上拷问出时代性来。

用世俗眼光看，和他们同班的还有一位“更成功”的付同学。这位同学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先是在公安部工作，上世纪90年代下海经商，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领导。等到有了初中同学群，他突然在里面“发难”，讲出影响自己一生的事。读初中的时候，他曾“偷摘”校外的野山楂，却被老师“通报批评”。

他认为，那个“告密者”就是王医生。这让王医生大为愤慨，他在群里大段发言，证明自己过去几十年，就是因为人格上不懂变通才处处吃亏，自己过去不是一个告密的人，现在也完全是凭专业技术吃饭，堂堂正正的。

这个争论，在同学群引起一场风波。对付同学来说，这次被举报影响深远，他认识到“社会”的险恶，也影响到后来诸多的人生选择。而在王医生那里，则有另外一桩影响巨大的“心事”，初中毕业的时候，老师本来告诉他可以保送，最终他却不在保送名单中。虽然他最终也考上重点高中，而且高考成绩优秀，但这仍是影响他一生的大事——他也看出“社会”可怕的一面。

我们现在看来，这都是“小事”，即便是当事人后来也遇到过很多大事件，但是这样的小事对他们的影响仍然是决定性的。这种有关灵魂的细节，才是作者关注的重点。《张医生和王医生》真正的主题并不是“如何实现阶层变迁”，而是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如何利用知识和经验，构建出一个“新的自我”。

工人子弟从小处在“群居”中，一起玩的都是厂里的孩子，他们也天然承袭了父母一辈的“气质”。对工人来说，“团体”和“自己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向领导打小报告”则被认为是不地道、见不得人的“背叛”行为。他们也继承了父母一辈的风气，认为“凭本事吃饭”是至关重要的品质。

但是所有人又都知道“社会”是客观存在的，你要“成功”，就必须“适应社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在沈阳这样的工业城市，出现下岗潮，这给人们带来了观念的冲击：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为什么那些“老实人”开始被边缘化？在这个“社会”上，如何受到人们的尊重？父母一辈的经验，已不能够解释这个世界，即便是现在已经“不惑之年”的张医生们，也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不管是王医生还是张医生，都面临着这样的内心危机。尽管用世俗观点看，自己过着不错的生活，但是在内心他们仍然孤独无助。王医生在一个网络医疗平台上，拼命回答患者问题，从而成为全国医生的佼佼者。张医生最感到开心的场景，则是看门诊。有一个章节，作者详细记录了张医生一个上午的门诊情况，值得我们认真阅读。看门诊的张医生是最有魅力的，不但极具专业性，还非常有耐心和从容，而且不缺幽默感。别的门诊结束了，他还在继续看，看完一上午30个病人，又来两个没有挂上号的，他也帮着看片子。在这个场景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新的自我”建立在专业基础上的认同感。

张医生和王医生身上的故事，几乎发生在所有“新中产”身上，读这本书，你会陷入某种回忆，重新打量自己，想搞清楚自己的“来处”以及现在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模样。就这个意义上说，这是2021年我看到的最好的“中国故事”。

伏特加政治：酒精、专制和俄罗斯国家秘史

从一个容易被当成笑话的切口，去看俄罗斯国家进程以及政治演变中的隐秘。

□ 徐 冰

提起那个北方邻居俄罗斯，你脑海中条件反射地会想到什么？AK47、战斗民族、北极熊、红场“洋葱头”，还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俄罗斯的一项调查则显示，在俄罗斯人心中，最能代表俄罗斯的主要标志是——伏特加。

俄罗斯人的豪饮的确名声在外。可是他们为什么单单对伏特加情有独钟，一般人除了知道严寒这个原因，其他大体所知了了。直到看到这本《伏特加政治：酒精、专制和俄罗斯国家秘史》，我也才发觉，原来居然是这么回事。

本书作者希拉德认为，俄罗斯人并不是一直就钟情于伏特加。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他们开始喝的也是葡萄酒、啤酒以及自己的传统饮料格瓦斯。俄罗斯历史中疯狂豪饮的君主很多，但他们喝的并不是伏特加而是葡萄酒。伏特加这种蒸馏酒在俄罗斯的历史并不长，直到16世纪才在俄罗斯扎下根。问题是伏特加一经扎根，就深刻地改变了俄罗斯社会。书中引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如果啤酒和葡萄酒是弓和箭，那么伏特加就是大炮——它具有传统社会所无法想象的能量，它最终将给经济和文化带来革命般的创新。”

革命般的创新是什么？表面看，伏特加让俄罗斯人深深地沉溺于酒精难以自拔，甚至形成了所谓的“伏特加文化”，但作者眼光刁钻，他认为，伏特加的出现，为俄罗斯专制者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统治工具。俄罗斯人沉溺于伏特加，是统治者数百年来刻意提倡的结果。

伏特加的酒精度更高，更容易喝醉。人一喝醉了不光容易胡说八道，还容易说真话。在主要喝葡萄酒的时候，伊凡雷帝就常让人记下喝醉的贵族们所说的话。第二天他会拿着那些话去质问那些宿醉刚醒的马屁精。他的这种做法被完美地继承了下来。很多人都知道，斯大林的酒宴就不是好喝的，不仅要拼命喝博得领袖欢心，营造团结祥和的氛围，更得小心不能喝大了说漏了嘴。而对于普通群众来说，经常酩酊大醉使得人更加原子化，分割分裂、消沉温顺，这样的社会显然更容易统治。

伏特加价格便宜、生产简单、利润更高，是完美的财政增收工具。在18世纪和19世纪沙皇俄国顶峰时期，酒类贸易收入占到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即使在20世纪末，伏特加依然贡献了整个国家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

一般来说，国家机构功能有三个方面：防范叛乱、保卫国家、开发社会资源。而在俄罗斯，这三个功能的实现完全离不开酒精的参与。

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但书中有些例子让人深思。比如拿破仑攻陷莫斯科。俄国人撤走时放了把大火，把莫斯科烧了个一干二净，使得拿破仑的大军既找不到吃的也没有地方抵御严寒。而这把火之所以烧得如此之大，是因为俄国人点燃了酒馆和伏特加酒仓库。因此，究竟是库图佐夫还是伏特加打败了拿破仑，较真琢磨的话还真说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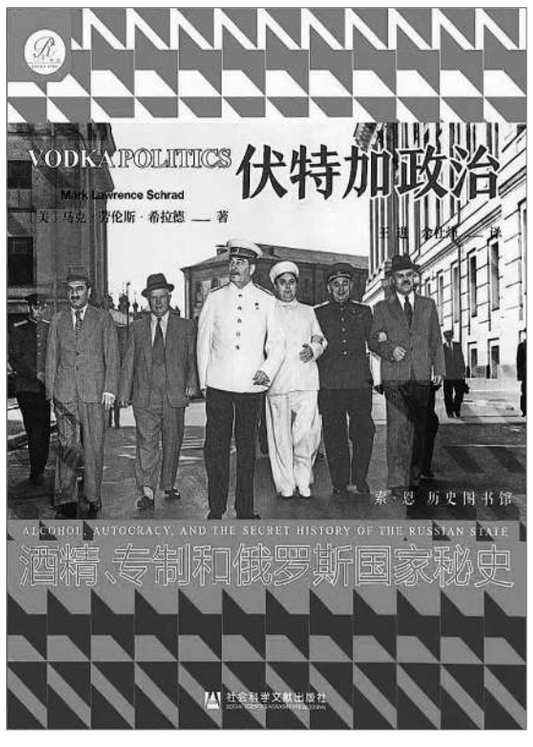
再如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处于最危险时刻的时候，斯大林发布第227号命令：“绝不后退一步！”这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很快被用来命名了一种苏联最畅销的伏特加酒。卫国战争期间，军队内部定量供应伏特加的传统重新被起用。在4年时间里，2800万人每人每天都能得到一杯伏特加。为了供应每年多达10亿升伏特加，苏联的伏特加酒工厂昼夜全力运行，就像生产武器的工厂一样。

就算不是主要因素，也不可否认在帮助俄国人打赢战争上，伏特加的确助了一臂之力。相反的例子则是，一战期间，正当俄罗斯在战场上焦头烂额之际，沙皇尼古拉却发布了禁酒令。1916年，俄国杜马通过一项法案，使得禁酒令成为一条永久且绝对的禁令。然而，等到这项法案可以上交请求沙皇批准的时候，沙皇却已经不存在了。

类似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让人忍不住以为是一本关于喝酒的段子集。可这本书分明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它考察了酒类尤其是伏特加酒在俄罗斯的影响和作用，从一个容易被当成笑话的切口，看到了俄罗斯国家进程以及政治演变中的隐秘。

杯中乾坤大。人们总是以为，做重大决定之时肯定要完全清醒。事实却是，许多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常常酒气熏天。二战最黑暗、最艰难之时，丘吉尔到访苏联，和斯大林用一晚上的狂饮巩固了伟大的联盟，最终击倒了强大的纳粹军队。

毫无疑问，这场“夜宴”是伏特加的高光时刻，但在“伏特加政治”中，这样的高光时刻俯拾皆是。比如，由于放了十月革命第一炮，阿芙乐尔号光芒四射。书中透露，放了那一炮后，有的船员加入了攻占冬宫的队伍，大多数船员则攻占了附近的一家酒馆。



陈道明送票，有嚼头的人艺海报故事

每张海报都有一个故事。海报上，海报创作者，没有署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

《人艺海报的故事》是一本让人拿起放不下、特别有嚼头的书。本书以郭娜画的海报为线索，讲述近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人艺”）的新故事——既有海报创作的故事，也有剧组排练演出时的趣事，还有人艺内部一些不为人知而有历史价值的旧事。

写书的两位作者郭娜和徐德亮是两口子，一起讲述，令人眼前一亮。郭娜2005年进入北京人艺后，设计了人艺几乎所有的海报和宣传品。徐德亮身份很多，相声演员、书画家、作家，最重要的是，他也跨界到了话剧，创作了剧本《天命》并担任主演，在央华版话剧《雷雨》中饰演鲁贵。郭娜透露，人艺话剧《莲花》《阮玲玉》《我们的荆轲》《玩家》《名优之死》等都是徐德亮题写的剧名。这本书是他们情感和生活的见证，是属于他们两位的艺术人生。

陈道明居然亲自送来了两张票

一出话剧，谢幕时得到观众最多掌声的是演员，海报创作者一直在聚光灯的后面。话剧《喜剧的忧伤》本身就是世界名剧，又是陈道明阔别舞台30年后的回归之作，加上何冰的绝佳演技，使该剧成为当年最成功的舞台戏剧，创造了票房奇迹。

郭娜的设计理念是：设计喜剧的海报，往往色彩要鲜艳跳脱，图像滑稽可笑，如果用演员剧照，往往会表情动作夸张搞笑。但《喜剧的忧伤》并非闹剧，既是“喜剧”，也有“忧伤”。喜剧只是其外壳，深深的悲凉和启人思考才是其真正的内涵。

正如老舍先生说的，“我要写一出悲剧，里边充满了无耻的笑声”。要把这些外在与内在都表现出来，没有一些形式感是不行的。

于是，郭娜在和导演徐昂以及主演陈道明、何冰沟通了几次后，陈道明出了个好主意，他让人给他和何冰各照一张表情或严肃或暗含笑意，分别以左右手指额的剧照，提供给郭娜，让她作为设计元素。

“拿到剧照，我就马上觉得，这回感觉对了！”

在郭娜设计的海报上，一切视觉呈现都是黑白两色的。黄色又是最亮的颜色，“喜剧”和“忧伤”在一派时尚和历史的混淆色调中跳了出来，突出了剧名，视觉上又不突兀。海报一贴出去，立刻得到了导演、演员、观众的一致认可。

“我性格比较内向，也有点艺术家的小架子，办公室同事都跟陈道明照了相，我却没有。”郭娜说，“陈道明老师对这一版设计非常满意，要知道当时这戏火到一票难求，剧院内部的同事连想买一张票都不可能。陈道明居然亲自给我送来了两张票，让我受宠若惊，也让我有点暗喜。”

海报背后是设计者的匠心，更有艺术家“拨云见日”的艺术眼光，一份海报，是一份艺术家别样的艺术履历。

“司马迁”三个字不能乱摆

海报、戏单除了有收藏展示作用，还是很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很多戏剧的历史都在其中。

话剧《司马迁》的海报是以题字为主体的，题字者就是编剧本人——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熊召政，该剧由任鸣和冯远征共同执导。郭娜说，将太史公司马迁的故事搬上话剧舞台，是冯远征多年的心愿。

冯远征是陕西韩城人，2005年，冯远征回家乡参加纪念司马迁公祭仪式，结果他发现很多嘉宾都不知道司马迁是韩城人。从那一刻起，他心里就萌生了创作一部话剧《司马迁》的念头。

从抓剧本创作到正式公演，冯远征用了整整10年。连熊召政都说这个戏是“十年磨一戏”。而司马迁写《史记》也是用了10多年的时间。

这部剧如此具有历史厚度，海报自然不能做得太轻飘了。拿到熊召政的题字以后，郭娜设计了好几稿，都不太满意，其间还差点犯了错误——为了寻灵感找美感，她把“司马迁”三个字的位置间距拉大缩小，甚至连落款一起错落编排。徐德亮看了一眼，果断否定了。徐德亮说，中国书法是联贯的整体，书法家最在意的就是自己写的字被人重新编排，不但完全不注意书法作品的整体性和行气，有很多时候连书法的基本格式和规矩都破坏了，让别人觉得自己连最基本的书法格律都不懂，怎么能不大怒？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后来在海报单上，“司马迁”三个字完全是作者写在宣纸上的样子。

91岁的蓝天野一屁股坐地上了

《人艺海报的故事》有嚼头还在于书中不是就海报写海报，而是写了很多观众读者可能永远也不知道的“乐子”，这些“乐子”背后的“角儿”才光彩照人。

人艺著名编剧郭启宏写过一部历史话剧《大讼师》，这部戏排练的时候是91岁高龄的蓝天野和青年演员韩清联合导演。在排练中，蓝天野并非用坐而论道的导演办法，而是经常起身给演员走位置、做示范。有一次排练中场，韩清抬头一看，蓝天野一屁股坐地上了，这可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怎么啦？怎么啦？”所有人第一时间都围过去了。

“没事没事。”蓝天野说，“我给演员做示范呢！”其实是剧里有一个小混混打架不小心坐地上的情节，他老人家也要亲自示范。令人难忘的是，他的90岁生日和91岁生日都是在剧场度过的。在演出的海报上，有蓝天野老师题写的《大讼师》三个遒劲有力的毛笔字。

“艺术家真的是能给年轻人起到表率作用，不是喊口号说大道理，而是潜移默化中诠释着四个字‘戏比天大’。”郭娜说。

书中还写到很多演员的趣事。班赞在出演话剧《玩家》的时候，饰演一个“收破烂的”，为了人物形象逼真，愣是用自己的两条新裤子和食堂的付师傅换了一条满是油星子的布裤子上台演出；1988年，美国导演查尔顿·赫斯顿来人艺排演话剧《洋麻将》，“他排戏和我们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掐着秒表排，这是我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见。”当时的副导演任鸣说；青年演员杨佳音的“两遍澡”的故事，在人艺也是人尽皆知。每次演出，他都要洗两遍澡。开场前洗一遍，然后化妆，进入角色。演出完毕，卸妆，褪去粉黛，再洗一遍，洗回本我……

徐德亮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是他撺掇郭娜写这本书的，在他看来，海报背后记录着话剧的历史，同样是艺术界的宝藏。不用多，20年之后，这些故事就将是话剧界甚至艺术界口口相传的“典故”。

“老一代的和人艺相关的如老舍、曹禺、于是之、英若诚等先生的老故事，大家都已耳熟能详，但人艺当代艺术家们的新故事也同样好听。”徐德亮说，走在前面的是故事，而走在背后的，是这些年人艺的艺术指导思想和培养人才的方向。

是的，每张海报都有一个故事。海报上，海报创作者，没有署名。